



为什么说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是错误的？

栏目主持人：徐 黎

提问:朱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三班学员

请问，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解答:张志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主任、教授

“实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已经成为相当时间一个流行的说法。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不严谨的，在现实中更造成了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因而是错误和有害的。

第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不是中共中央的提法，在党章、党规、党内法规性文件和其他党内文献中，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提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说法，最早的出处是源于建党8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党的历史方位两个历史性转变的重大判断，其中第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完整表述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这个表述是非常严谨的。后来一些人为了简便，就把这个转变的表述简化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严格地说，这种对党的重大判断和论述的随意缩减更改是不严肃的，是违背党的规矩和纪律的。

第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种说法也是不严谨的，是不符

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共产党在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不仅仅是一个革命党，我们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区，都局部执政过，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局部执政的光辉业绩，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执政本领，不仅在生产建设方面，而且在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是包括美国军事考察组、党外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领袖等在内的人士都极为钦敬的。而且，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只要对中华民族和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政治变革形式，我们党都无私无畏地去尝试过、实践过，我们党在建党初期通过议会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我们党主动争取与国民党两次合作，我们党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联合政府，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民族前途，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争取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共商建国大事等等，这些生动的历史事实都不是一个革命党的概念所能够涵盖的。所以，党中央在建党80周年时使用了“领

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而没有用“革命党”的提法，是对此有慎重和缜密考虑的。

第三，“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造成了思想上的模糊认识。这些模糊认识对于新时代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推动和实现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伟大斗争实践是消极的，对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不利的、有害的。

首先，它造成的模糊认识是去革命化的倾向。这种说法至少很容易引起这样的误会，为什么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呢？难道革命党错了吗？难道中国革命错了吗？难道革命本来就是错误的吗？从而越来越对革命缺乏敬畏感，越来越否定革命的价值和精神，否定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否定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个别的发展到否定诽谤中国革命的先烈先贤的地步，更有甚者，是把这种去革命化的倾向，延伸演变为去政治化、去斗争化，只要一谈讲政治，只要一谈斗争精神，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搞“极左”那一套。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上的集中体现，是非理性的。其造成的后果也许是持这种说法的人所难以想象的，那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这种模糊认识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澄清，就很难在党的领导下凝聚起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也很难真正做到“四个自信”。

其次，它造成的模糊认识是去领导化的倾向。“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很容易造成仅仅从执政角度理解党的执政方式而忽视党对政权的领导方式的倾向，通过强调执政

党建设和执政规律，否定党的领导规律的价值意义。在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方式。因此，新时代我们党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克服这种非此即彼的片面性，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and 党的执政，使党的全面领导的过程成为党更自觉地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过程。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实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保证党对政权的高效领导，这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制度上实现依法治国的原则，以保证党对政权的有效运作，这是党能够领导和善于领导的基本保证。因此，从党的执政方式考量，党的全面领导，应该是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善于运用一切制度安排和领导资源去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高效治理和强力影响。这才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守正出新，既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本色和精神，又能以这种自我革命精神更自觉地遵循领导规律和执政规律，领导人民实现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运用区块链技术创新行政管理

□ 饶立新

区块链技术是基于多种技术组合而建立的信任、激励和约束机制，可以有效提升完善各领域的治理架构，为创新行政管理、更好履行三项重大职责开辟广阔空间。建设可信体系和智慧城市、创新数据经济模式、提供优质公共服务都是提升行政管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作为中青年干部，要准确把握区块链技术发展规律及特征，积极运用区块链技术创新行政管理，更好地履行职责。

运用区块链技术创新行政管理，更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信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也是一个稀缺品。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主体间缺少信任，交易成本高、违约风险大导致的。合理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账本和智能合约特征，发挥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将有效解决信任机制

搭建难、信息真实性验证难等问题，推动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实现从“信息互联网”迈向“信任互联网”时代。政府、企业、个人通过“信息上链”，可以让经济社会运行变得更加透明，各主体间信息流畅可信，交易成本大幅降低。要准确把握和应用区块链技术，推动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行为深度融合，促进信息、资金、人才、征信等方面更大规模的互联互通，保障生产要素有序高效流动，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运用区块链技术创新行政管理，切实增强管理社会事务能力。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持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与新形势新要求相比，仍存在部门间监管信息难共享、监管资源难整合等问题，多头重复检查等现

象仍未彻底消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有效利用区块链技术，一方面能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中政府与企业“监管与被监管”角色定位。政府公开数据、企业经营数据通过访问控制策略在链上予以共享共识，企业化“被动接受监管的客体”为“主动参与监管的主体”，政府化“被动接受监督的客体”为“主动要求监督的主体”，从而建立政府与市场主体间合作共治共赢的关系。另一方面，能提升政府部门间的监管合力，利用区块链形成“共识机制”，可以打通全网信息通道，推进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通过政府部门、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链上交互”，全面掌握市场主体实时动态信息，联合开展监控分析和预警应对，增强监管的时效性、精准性，提升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运用区块链技术创新行政管理，努力提升服务人民群众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当前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重点，其目的就是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块链+政务服务”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提供了现实可能。利用区块链技术，各级政府部门成为“政务服务链”上的一个个结点，通过智能合约在链上分别“记账”，通过这张分布式“账本”，可以有效促进业务协同办理，让人民群众“进家门、办多家事”；同时，通过信息公开，区块链能够实现部门间的政务信息共享和整合，推动大幅简并业务事项、优化业务流程、减少资料报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显著降低人民群众办事成本。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司长）

在深化理论学习中增强“四个意识”

□ 王 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根源上说都是思想上的问题。党员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理解，在深化理论学习中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增强政治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想处处体现出旗帜鲜明讲政治、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要求，其核心要义就是坚守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能力。要深刻领会其中蕴涵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注重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增强大局意识，提高能力素质。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只是从事某一方面的具体工作，自己的视野和思维容易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通过深化学习，更加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学会总揽全局、把握大势，坚持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来谋划和推动工作。

增强核心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带领中国人民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进行伟大实践创新战略，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勾画出壮美的蓝图。要结合党的历史、中国历史及世界历

史的发展脉络，审视当代世界格局及发展趋势，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伟大实践创新的重要指导意义。

增强看齐意识，提高党性修养。要带着看齐意识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报国、真挚为民的崇高风范，不断提升党性修养，通过理论学习筑牢党性修养的思想基础，经过实践锻炼把党性修养转化为自觉行动。深入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照初心使命要求，进一步检视自身在宗旨意识和工作作风上的差距，在工作中采取更加务实精准的行动举措，在作风上体现更加饱满热情的勇气担当。

（作者系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 任 宇

深圳，在贯彻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2018年，深圳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政策，适用于数字经济等深圳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19年5月，深圳市对外发布2020年第一批数字经济产业扶持计划申请指南，明确了“数字经济”两大支持领域。

作为中国“最互联网城市”，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深圳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仍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实现增加值726.5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高于GDP增速0.6个百分点。服务业企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九成。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应用软件开发、互联网游戏服务、基础软件开发领域等领域对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0%。

与此同时，一系列相关国家政

策的出台为深圳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深圳数字经济创新及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向。2019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将广东省列为六家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之一。要求广东省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主要载体，加强规则对接，重点探索数字经济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机制，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深圳，已经立于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发展的潮头，内在基础雄厚，数字经济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外在政策助力，数字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背景，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和“先行示范区”为方向，深圳同样要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文章。目前，深圳有华为、富士康等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有腾讯这个以线上社交娱乐文化为代表的纯线上数字经济。未来深圳的产业版图里可以通过引入如阿里、京东、拼多多和美团那样的能够连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大型平台服务商在此创立或落地。那么，深圳将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充分融合发展，由此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占据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作者系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世界工业研究所副所长）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并指出“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政德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从政之基。为此，领导论苑版面从本期起开设“政德大家谈”栏目。

政德即官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世间行业有万千，均应各守其德。师有师德，医有医德，商有商德，艺有艺德，官有官德。对为官从政者来说，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时，必须恪守基本的职业道德、政治操守及为官底线，这便是官德。领导干部讲政德，崇官德，才能以德修身、以德润才、以德服人，其才方能用得其所，其功方能垒土成台，使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对国家有用、对人民有益。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为官从政者要做到以德修身、以德为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荀子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西汉刘向说：“道德不厚者，不可使民。”凡此种种，都是在强调为官之德的重要。可以说，做官须先做人，为官须先修德，根本在于德是修身之本、为政之要。

官德影响民风淳朴与否。《论语》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官德淳则民风正；官德毁则民风降。官德的好坏，就像是一扇窗子、一面镜子、一座风向标，它能折射出社会风尚的好坏，能对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和家风起到引领的作用。官德修养绝非是官员个人的私事，可有可无；官德姓公不姓私。

官德关乎国家治乱安危。《左传》中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官员的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民生的福祉、法律的尊严、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治乱之要，其本在吏。”官员如果失去道德的约束，就会出现贿赂公行、国将不国的危险局面。可以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无数实践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官德隆，国必昌；官德毁，国必亡。”

所以，为官从政者必须要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自觉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民众的表率。

在历朝历代的官箴书和儒家思想中，都对为官者的道德修养、个人操守、修身做人提出了严格而具体的要求，始终把“道德价值”放在首位，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也没有动摇过。官员德行好坏与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极大。德既是立身之本、为官之魂、为政之要，同时也是立国之基。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经济、军事、科技固然非常重要，但道德、文明、信仰、精神、价值观同样不可或缺，只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才是综合国力

政德乃为官为政之本

□ 王 杰

的体现，尤其在满足温饱以后，道德、文明等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有大德方能成大业，领导干部要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用道德的力量感染人、鼓舞人。从焦裕禄到杨善洲，从谷文昌到廖俊波，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之所以能被广大人民群众铭记于心，正是因为他们恪守了为政之德，始终能够做到守身如玉、清廉自守、执政为民。要推动新时代中国巨轮扬帆远航，就需要有更多政德卓越的领导干部涌现出来，这是国之所望、民之所幸。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政德
大 | 家 | 谈

来论摘编